

#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提升了农民幸福感吗?

初立苹<sup>1</sup>, 高 静<sup>2</sup>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2.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 农民幸福感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 而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基于 2012—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 KHB 方法, 探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 尤其在中共党员、年长者的个体中更明显; 相对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城乡社会保险融合和城乡社会救助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机制分析表明,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转移养老风险和医疗风险、增强家庭认同来提升农民幸福感。边际效应表明,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 0.378 和 0.546。据此建议进一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深化, 加大对农村特定群体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关键词** 农民幸福感;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风险转移; 阶层认同

**中图分类号:** F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5)04-0011-11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5.04.002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 作为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 幸福感在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广大居民幸福感如何, 更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议题。从整体上来看, 居民幸福感呈持续上升态势, 幸福人口的比重逐年增多。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 CGSS)数据显示, 2012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21 年我国城市幸福人口比例<sup>①</sup>分别为 77.55%、72.35%、79.71%、82.51%、82.92% 和 85.27%, 而农村则依次为 73.59%、72.22%、75.62%、74.02%、76.36% 和 79.19%。可见, 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建设力度, 但整体上农民幸福感仍较低。因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民幸福感的提升被赋予更高层次的意义: 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是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必经之路与现实需要, 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等约束条件下为全体国民提供福利保障的适应性选择<sup>[1]</sup>, 覆盖民生具体内容, 成为不同阶段民生理念得以践行的政策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这无疑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出新要求。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制度层面上城乡居民全覆盖的巨大成就, 但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主要体现在缴费标准、待遇给付等方面,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是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

收稿日期: 2024-12-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融合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推进路径研究”(23YJA790010)。

① 年度样本中感到“比较幸福”及以上的人口占对应样本总体的比例。

部分学者围绕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进行大量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积极收入再分配效应不断缩小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待遇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基础<sup>[2]</sup>,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与生态资源的进一步盘活,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能<sup>[3-4]</sup>;在微观层面上,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降低生活成本、提升收入水平显著促进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sup>[5]</sup>,特别是城乡医保整合使农民定居城镇和在城镇购房意愿得以提升<sup>[6]</sup>。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此外针对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制度<sup>[7]</sup>。这些举措既体现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程度逐步加强,又表明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安全网、稳定器、兜底线的作用,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同时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从而影响农民幸福感。

也有部分学者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一是正向影响<sup>[8-12]</sup>,比如 Delhey 等指出,社会保障降低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焦虑情绪减弱,幸福感增强<sup>[13]</sup>;二是负向或者不相关<sup>[14-15]</sup>,如 Ouweneel 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失业津贴受益者的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微乎其微<sup>[16]</sup>;三是倒 U 型, Hessami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sup>[17]</sup>。因此研究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与农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很重要<sup>[18]</sup>。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及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如下几点有待改善:一是关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相关研究以定性为主,仅有部分进行测度,而对农民生活状态影响效果的评估仍未得到有效开展;二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的现有研究中侧重某一方面融合,鲜有从整体及不同维度上测度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程度;三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怎样的机制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政府举措与制度设计的终极目标,在于增进居民幸福感,同时经济学中将是是否增进和增进多少幸福感作为个体选择的最终评价标准<sup>[19]</sup>。相比城市居民,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是否会提升农民幸福感呢?这与农民幸福感的来源密切相关,概述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提高,二是精神生活丰富。围绕提升农民幸福感这一话题来说,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无论是对于农民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此一来,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会影响农民幸福感,那么农民幸福感是否会提升?提升多少?以及如何起作用?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还鲜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究,而这些相关问题的回答不仅利于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还会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继而最终提升农民幸福感。

本文基于 2012—2021 年 CGSS 数据,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较为深入地探究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研究内容更具有现实意义。幸福感尤其是农民幸福感提升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第二,数据更为精准。本文将宏观层面的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数据与微观层面的农民幸福状况信息进行匹配,基于此来分析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丰富居民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第三,研究维度多元。除从整体上研究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外,本文进一步细分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融合、城乡社会救助融合与城乡社会福利融合,以期对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动有所裨益。

## 一、研究假设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能否提升农民幸福感,一方面要从整体上考察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能否有效提升农民幸福感,另一方面也需要分析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提升的边际效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曾呈现城乡二元分割局面<sup>[1]</sup>。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除了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性<sup>[20]</sup>,还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结构的城乡二元性,使得广大农民无法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障,对资源配置与城镇化进程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促使社会保障制度由“普惠”走向“公平普惠”,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为提升农民幸福感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继而缓解农民贫困与增强农民的“公平感”,拓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农民幸福感的辐射边界。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阶段,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

在获得生活保障、改善生活环境等方面经常处于劣势,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存在着因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sup>[21]</sup>,即使移居到城市,幸福感也要低于本地居民<sup>[22-24]</sup>,主要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幸福水平产生影响<sup>[25]</sup>。而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标准,不仅使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也会明显增强农民的公平感与提升农民生活的保障水平,为农民构筑一道更为牢固的“幸福防线”,从而对农民幸福感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sub>1</sub>: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可以提升农民幸福感。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主要是通过风险转移和阶层认同两个层面对农民幸福感产生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显著降低,往往源于风险所伴随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负面心理体验,无论这些风险最终是否成为现实<sup>[26]</sup>。不管是自身经济实力还是社会环境,农民在应对风险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帮助他们防范与抵御这些风险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不仅使社会保障成为农民抵御风险的有力盾牌,而且通过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或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提供补偿,减轻风险冲击。这种保障机有助于制增强农民的生活安全感和预期稳定性。简言之,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与缓解农民的恐惧心理,也能减轻农民对未来风险发生的忧虑,提升农民的“安全感”,继而增强农民幸福感。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能提高农民的阶层认同,而且阶层认同越高,幸福感越强<sup>[27-28]</sup>。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城乡融合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农民个体对自己阶层认同的判断就会受到影响,会形成更高的阶层认同。现有研究表明,社会阶层认同及其正向流动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sup>[29-32]</sup>,其中农民社会阶层变化的幸福效应较城镇居民更为敏感<sup>[33]</sup>。可见,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能够促进农民阶层认同的提高,进而增强农民幸福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sub>2</sub>: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风险转移和阶层认同两个渠道,提升农民幸福感。

## 二、研究设计

###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主要来自CGSS和WIND数据库。具体来看,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社区环境数据均来自于CGSS,而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变量数据则来自WIND数据库以及历年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CGSS涵盖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该项目已进行两期,其中第一期为2003年至2008年,每年一次;第二期为2010年及以后,平均下来每两年进行一次。鉴于解释变量始于2012年,本文使用CGSS2012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和2021年共计6年的数据,与相应年份的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水平进行匹配;同时删去关键变量缺失样本,最终得到25219个观测值。

### 2. 变量定义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农民幸福感(*Happiness*)。在CGSS问卷中设有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受访者从“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5个选项中选择。本文据此构造农民幸福感的分类变量,分别用数字1到5表示,数值越大,幸福感越强。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稳健性,参考尹振涛等<sup>[34]</sup>,本文构造农民幸福感的哑变量,上述分类变量中的数字3—5界定为“农民幸福”,赋值为1;其他则界定为“农民不幸福”,赋值为0。

(2)解释变量:城乡社会保障融合(*SSecurity*)。本文参考叶璐等<sup>[35]</sup>、高静等<sup>[36]</sup>,基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三个子维度采用城镇与乡村比值的三级指标(见表1)对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进行测算,同时利用全局熵值法进行加权,得到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同时,也得到子维度指标,即城乡社会保险融合(*SInsurance*)、城乡社会救助融合(*SAssistance*)和城乡社会福利融合(*SWelfare*)。

(3)中介变量。关于风险转移,本文选择养老风险转移和医疗风险转移两个指标进行测度;而阶层认同进一步区分为家庭认同和自我认同两个方面。



表1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的多维测定指标体系及主要指标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乡社会保险融合	城乡养老保险融合	城乡人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比值
		城乡人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比值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发展率比值
	城乡医疗保险融合	城乡人均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压力比值
		城乡人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比值
		城乡基本养老医疗参保发展率比值
城乡社会救助融合	城乡低保标准融合	城乡平均低保标准比值
	城乡生活保障融合	城乡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城乡收入分配融合	城乡收入分配与公平指数比值
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城乡卫生融合	城乡每千人口床位数比值
		城乡每千人口人员数比值
	城乡教育融合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师生比比值

注:借鉴 Sen<sup>[37]</sup>,收入分配与公平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基尼系数)。

(4)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导致估计偏差,本文参考尹志超等<sup>[38]</sup>、王群勇等<sup>[39]</sup>,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社区环境三个方面选择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包括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健康状况、房屋产权;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经济状况、出行方便、子女数量;社区环境,包括社交娱乐频率与性别角色观念。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N=25219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民幸福感	分类变量:幸福感越大,数值越高,依次1—5	3.796	0.863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样本所在地的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1.145	0.596
城乡社会保险融合	样本所在地的城乡社会保险融合	0.930	0.776
城乡社会救助融合	样本所在地的城乡社会救助融合	14.552	36.192
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样本所在地的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0.843	0.211
养老风险转移	受访人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1;否=0	0.641	0.479
医疗风险转移	受访人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1;否=0	0.918	0.274
家庭认同	分类变量:受访人家庭所处等级越高,数值越大,依次1—10	3.514	8.378
自我认同	分类变量:受访人自身所处等级越高,数值越大,依次1—10	4.526	7.127
教育程度	从文盲、扫盲班、小学……到研究生以上,依次1—13	3.751	2.332
婚姻状况	受访人的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	0.784	0.415
性别	受访人的性别:男性=1;女性=0	0.471	0.499
健康状况	分类变量:受访人越健康,数值越大,依次1—5	3.479	1.147
房屋产权	受访者及其配偶是否拥有房屋产权:是=1;否=0	0.617	0.486
家庭人口	受访人的家庭总人口数	3.137	1.574
经济状况	分类变量: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数值越大,依次1—5	2.507	0.729
出行方便	家庭是否拥有汽车:是=1;否=0	0.161	0.368
子女数量	家庭中儿子数量加上女儿数量	1.981	1.331
社交娱乐频率	分类变量:社交频率越高,数值越大,依次1—6	4.535	2.101
性别角色观念	分类变量:夫妻越应该分摊家务,数值越大,依次1—5	3.787	1.038

3. 模型设定

由于农民幸福感属于分类变量,本文旨在剔除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后,考察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农民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建立如下有序Probit模型来识别待估参数:

$$Happiness_{ipt}^* = \beta_0 + \beta_1 \times SSecurity_{pt} + X_{ipt}\theta + \alpha_p + \mu_{ipt}$$

(1)

$$Happiness_{ipt}^* = \begin{cases} 1, & Happiness_{ipt}^* \leq r_1 \\ 2, & r_1 < Happiness_{ipt}^* \leq r_2 \\ 3, & r_2 < Happiness_{ipt}^* \leq r_3 \\ 4, & r_3 < Happiness_{ipt}^* \leq r_4 \\ 5, & r_4 < Happiness_{ipt}^* \leq r_5 \end{cases}$$

(2)

其中, $Happiness_{ipt}^*$ 为农民幸福感的潜变量, $r_1 \cdots r_5$ 是截点,满足 $r_1 < r_2 < r_3 < r_4 < r_5$ ;  $SSecurity_{pt}$ 为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X_{ipt}$ 为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人的个体特征、家庭层面和社区环境变量; $\alpha_p$ 为省份固定效应, $\mu_{ipt}$ 为随机误差项, $\beta_0$ 是常数项, $\beta_1$ 为待估计系数,下标*i*、*p*和*t*分别表示农民个人、所在省份和年份。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综合效应的回归结果见表3。由于被解释变量“农民幸福感”为有序分类变量,因此选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分析;借鉴陈吉平等将农民幸福感视为连续变量使用OLS作为基准回归的辅助方法<sup>[40]</sup>,其估计系数就是对应参数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sup>[41]</sup>。

表3中列(1)和列(3)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省份效应的条件下,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列(2)和列(4)加入社区环境层面控制变量,发现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显著地提升了农民幸福感。

可以看出,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有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弥补多年来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幸福感的冲击,也为更好地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可能的路径。可能的解释:真正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是农民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sup>[42]</sup>,而社会保障是典型的收入再分配方式之一,因此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明显地推动这一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发挥,也逐步促进社会公平,继而提升农民幸福感。

进一步地探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的子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见表4)。其中,列(1)~(3)依次汇报城乡社会养老保险融合、城乡社会救助融合和城乡社会福利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列(1)~(3)中三个子维度的系数为正,且城乡社会养老保险融合和城乡社会救助融合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的城乡融合有力提升农民幸福感。相比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N=25219

变量	有序 Probit		OLS	
	(1)	(2)	(3)	(4)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0.048*** (3.10)	0.056*** (3.63)	0.035*** (3.20)	0.042*** (3.78)
教育程度	0.014*** (3.78)	0.016*** (4.21)	0.012*** (4.63)	0.014*** (5.10)
婚姻状况	0.066*** (3.55)	0.066*** (3.48)	0.062*** (4.59)	0.062*** (4.55)
性别	-0.050*** (-3.48)	-0.027* (-1.88)	-0.032*** (-3.12)	-0.017 (-1.62)
健康状况	0.182*** (26.26)	0.180*** (25.54)	0.136*** (27.49)	0.134*** (26.69)
房屋产权	-0.025 (-1.61)	-0.039** (-2.43)	-0.015 (-1.37)	-0.025** (-2.23)
家庭人口	0.008 (1.61)	0.005 (1.07)	0.008** (2.13)	0.006 (1.63)
经济状况	0.370*** (35.22)	0.364*** (34.00)	0.283*** (37.95)	0.276*** (36.63)
出行方便	0.131*** (5.79)	0.135*** (5.92)	0.075*** (4.68)	0.078*** (4.83)
子女数量	0.092*** (15.59)	0.091*** (15.01)	0.064*** (14.99)	0.062*** (14.30)
社交娱乐频率		0.027*** (7.52)		0.020*** (7.95)
性别角色观念		0.061*** (8.69)		0.039*** (7.71)
Pseudo R <sup>2</sup> /调整 R <sup>2</sup>	0.063	0.065	0.142	0.14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之下,城乡社会福利融合未能对农民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在城乡社会福利融合的过程中,农村地区社会福利供给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以特殊人群的现金保障为主,例如针对重度残疾人的护理政策、向有困难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政策等,而面向全体农村居民的普惠型社会福利项目发展仍不足,如普惠型教育福利、生育福利、基本公共福利<sup>[43]</sup>,使得现有社会福利制度受益面较窄,大部分农民难以在城乡社会福利融合过程中提高生活质量,自身幸福感变化不明显。

可以看出,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强有力地推动了农民幸福感提升,而且这一效应主要是在城乡社会保险融合和城乡社会救助融合两个子维度中体现出来。这也传递出一条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城乡社会福利融合并未对农民幸福感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要想通过社会保障这一路径提升农民幸福感,仍然需要依赖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的城乡融合。因为只有当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的城乡融合带来的温度,才能从物质上支持其经济活动,缩小社会保障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与身份差距,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也为后续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方向。

2. 异质性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不同子维度的社会保障对不同类型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且不同类型个体通过社会保障政策调整所获得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存在不同,以及不同类型个体对社会保障城乡融合制度变迁的解析能力不同,因此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个体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接下来本文将从政治面貌和出生年代来分析个体类型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中的幸福效应。

(1)政治面貌异质性。不同政治面貌公民在政治认同、危机压力与新发展理念认知存在着差异。为进一步探析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政治面貌异质性,参考张可云等<sup>[44]</sup>,本文将研究对象按照政治面貌分为:群众、中共党员和其他党派三大类,继而开展异质性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相对于群众和其他党派,中共党员对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提升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敏感,这说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于提升共产党员幸福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党员对国家民生政策更加敏感,特别是城乡差异的逐步缩小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阶层认同的信心。

(2)出生年代异质性。不同年代出生的农民,其经历与认知存在着较大差异。通常相对80、90后来说,40、50后由于当初经历了大饥荒、计划经济体制等使他们思想更加保守、对政府依赖性更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40、50后这一组显著为正,一方面与这个年代出生的群体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这些人目前正好处于相关制度的领取阶段,对相关制度及其改革更加敏感,尤其是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他们的幸福感得到快速提升。

表 5 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政治面貌分组			出生年代分组		
	(1)中共党员	(2)群众	(3)其他党派	(4)40、50后	(5)60、70后	(6)80、90后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0.153*** (3.13)	0.166 (0.68)	-0.016 (-0.17)	0.172*** (7.09)	0.011 (0.44)	-0.037 (-1.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sup>2</sup>	0.077	0.065	0.060	0.076	0.075	0.059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 边际效应分析

有序 Probit 模型为非线性模型,估计系数不是参数的边际效应,因此需要计算各参数的边际效应。考虑 *Happiness* 取值跨度为(1~5),对应着5个点的边际效应。表6汇报了解释变量分别在 *Hap-*

表 4 子维度的回归结果				N=24623
变量	(1)	(2)	(3)	
城乡社会保险融合	0.063*** (5.57)			
城乡社会救助融合		0.001*** (3.19)		
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0.047 (0.7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sup>2</sup>	0.066	0.065	0.06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piness=1,2,3,4,5处的边际效应。据此可知,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206,“比较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661,“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757,而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378和0.546,表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增强,明显降低农民感觉“不幸福”的比例,同时提升农民感觉“幸福”的比例。

表6 边际效应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1)Happiness=1	(2)Happiness=2	(3)Happiness=3	(4)Happiness=4	(5)Happiness=5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0.206*** (-3.59)	-0.661*** (-3.62)	-0.757*** (-3.63)	0.378*** (3.59)	0.546*** (3.63)
城乡社会保险融合	-0.231*** (-5.42)	-0.742*** (-5.55)	-0.849*** (-5.56)	0.425*** (5.43)	0.689*** (5.57)
城乡社会救助融合	-0.003*** (-3.16)	-0.009*** (-3.18)	-0.010*** (-3.19)	0.005*** (3.16)	0.016*** (3.19)
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0.171 (-0.72)	-0.548 (-0.72)	-0.627 (-0.72)	0.312 (0.72)	0.532 (0.72)

为进一步考察各维度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本文对子维度融合边际效应进行分析。由表6可知,城乡社会保险融合和城乡社会救助融合均显著地降低农民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同时提升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此外虽然城乡社会福利融合并未产生显著的边际效应,但符号与预期一致。简言之,无论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整体还是子维度,均通过降低不幸福的概率与增加幸福的概率进而最终提升农民幸福感。

四、进一步分析

1. 作用机制检验

为检验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是否通过风险转移与阶层认同进而影响到农民幸福感,本文具体分别以养老风险和医疗风险转移、家庭认同和自我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中介效应系数乘积项检验法不适用于非线性模型,因此本文采用Breen等<sup>[45]</sup>提出的适用于非线性模型的KHB方法,检验风险转移与阶层认同是否为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渠道。

通常,中介效应是指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经由中介路径进而对农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而直接效应则是指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直接产生的影响。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的加总则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总体效应。

表7报告了基于KHB方法的检验结果,列(1)和列(2)以养老保险转移和医疗风险转移为中介变量,而列(3)和列(4)以家庭认同与自我认同为中介变量。仅列(1)~(3)的中介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养老风险转移、医疗风险转移与家庭认同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显著路径,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影响农民的养老风险转移、医疗风险转移方式以及家庭认同进而对农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然而,自我认同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影响农民幸福感过程中扮演着遮掩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使得农民接触到更多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会有所下降,会产生自卑感和不满情绪,从而影响其幸福感,可见其对应的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

表7 基于KHB方法的作用机制检验

N=24623				
变量	(1)养老风 险转移	(2)医疗风 险转移	(3)家庭 认同	(4)自我 认同
中介效应	0.006*** (3.85)	0.001* (1.92)	0.003*** (3.33)	-0.005** (-2.13)
直接效应	0.051*** (3.26)	0.055*** (3.58)	0.054*** (3.45)	0.061*** (3.92)
总体效应	0.057*** (3.64)	0.056*** (3.63)	0.0567*** (3.64)	0.056*** (3.63)



可以看出,无论是风险转移还是阶层认同,均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影响农民幸福感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养老风险转移、医疗风险转移与家庭认同,支持研究假设H<sub>2</sub>,为更好提升农民幸福感提供明确的选择路径。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中介变量相对应的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均显著为正,再次支持假设H<sub>1</sub>,印证了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在提升农民幸福感进程中的重要角色。

2. 内生性问题

参考李仲武等<sup>[41]</sup>,为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采用条件混合过程(简称CMP),从而得到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果效应,而且估计效果更好<sup>[45]</sup>。当然,为缓解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内生性问题,CMP方法也需寻找合理的工具变量。基于此本文使用处于同一区域<sup>①</sup>的其他省级行政区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均值(简称“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均值”),作为该省份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的工具变量,通过CMP方法对原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一方面,同一区域之内不同省份的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程度会有所影响,比如邻近省份如果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有了很大进步,很可能给同一区域其他省份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带来压力,主要是社会保障融合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多方多种力量共同协调才能得以有效推进,否则会出现欲速则不达,这样一来在短期内可能对其他省份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以社会保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省级统筹为主,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考虑到制度环境的局限性,即使临近省份的城乡社会保障政策有融合的趋势,但由于各省级行政区的制度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因素,这种融合的效果可能无法直接影响,因此农民更可能关注自身省份的制度安排。

同时,为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参考Chyi等<sup>[46]</sup>,借用线性模型的弱工具变量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第一阶段回归分析表明,同一区域其他省份的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本省级行政区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存在同伴效应,而且F值均大于16.38,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见表8<sup>②</sup>),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正向影响农民幸福感,而且系数均接近表3和表4中的对应数值,则表明处理内生性后的结果更可靠。

表8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

变量	CMP 估计结果			N=24666
	(1)	(2)	(3)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0.099*** (6.26)			
城乡社会保险融合		0.030** (2.40)		
城乡社会救助融合			0.001*** (2.96)	
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0.081 (0.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选用替换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因变量为二元变量,因此借助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9)。同时,考虑到政策变迁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着时滞性,为此基于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见表9)。可以看出,无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选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均证实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显著地提升了农民幸福感。从子维度来看,相对城乡社会福利融合,城乡社会保险融合与城乡社会救助融合更显著增强农民幸福感。

五、结论与启示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全面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微观层面的农民幸福感数据与宏观层面的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数据,使用有序Probit模型检验了

① 将27个省级行政区按照区域分成东部、中部与西部,其中东部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  
② 限于篇幅,仅汇报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表9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N=24666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1)	(2)	(3)	(4)	(5)	(6)	(7)	(8)
(L.)城乡社会保障融合	0.074** (2.18)				0.042*** (3.78)			
(L.)城乡社会保险融合		0.103*** (4.05)				0.042*** (5.24)		
(L.)城乡社会救助融合			0.001* (1.93)				0.000*** (2.94)	
(L.)城乡社会福利融合				0.023 (0.16)				0.062 (1.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sup>2</sup>	0.1059	0.1063	0.1059	0.1058	0.1452	0.1457	0.1450	0.144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乡社会保障融合的幸福效应。研究表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显著地提升了农民幸福感,这一影响对于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40、50年出生的农民更加凸显。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养老风险转移、医疗风险转移与家庭认同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径。相对城乡社会福利融合来说,城乡社会保险融合和城乡社会救助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幸福感,为此需要高度重视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在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逐步整合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制定合理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确保农民能够负担得起,使得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当的社会保障服务。二是在推进城乡社会保障融合进程中,应考虑到农民政治面貌与出生年代的差异,有必要因群体差异而采取针对性措施,特别是要加大60、70年代出生群体的支持力度,在缴费环节、待遇领取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充足性和可持续性,切实提升农民幸福感。三是逐步完善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时的社保转移接续政策,确保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时能够得到无缝衔接的社保权益,同时应采取相关措施助力灵活就业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而增强更高的阶层认同,旨在为提升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居民幸福感提供更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理性的个人认知。

参 考 文 献

[1] 席恒,余澍,李东方.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100年回顾[J].管理世界,2021,37(4):12-24.

[2] 朱恒鹏,杨志勇,洪俊杰,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笔谈[J].经济学动态,2021(9):3-21.

[3] 黄祖辉,胡伟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J].农业经济问题,2022(7):15-24.

[4] 郁建兴,任杰.迈向精准治理:后小康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J].公共管理学报,2022,19(3):1-11.

[5] TIEBOUT C M.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416-424.

[6] 赵紫荆,王天宇.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农村居民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的证据[J].保险研究,2021(12):97-119.

[7] 韩克庆.社会保障公平性的测量准则与效果评估[J].社会保障研究,2019(3):82-99.

[8] EASTERLIN R A,MORGAN R,SWITEK M,et al.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2010[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2,109(25):9775-9780.

[9] 姜茂敏,涂爱仙.社会经济保障对衰弱老年人幸福感的跨层次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3):71-81.

[10] 褚雷,邢占军.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22(2):42-50.

[11] 钟晓雯,高洁.“人工智能+医疗”的风险研判及治理路径[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0(4):29-41.

[12] 程名望,华汉阳.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0(2):46-61.

[13] DELHEY J,DRAGOLOV G.Happier together, social cohe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urop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

- chology, 2016, 51(3):163-176.
- [14] VEENHOVEN R. Freedom and happiness: a comparative study[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0, 1(2):145-166.
- [15] 易定红, 赵一凡. 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 41(6): 99-112.
- [16] OUWENEEL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happin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58(1):1-20.
- [17] HESSAMI Z. Social security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0, 31(3):404-415.
- [18] FREY B S, GALLUS J. Political economy of happiness [J]. Applied economics, 2014, 45(30):4205-4211.
- [19] 汪丁丁. 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0(7):3-11.
- [20] 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挑战 [J]. 决策探索(下半月), 2014(1):18-20.
- [21] 黄有光. 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2] KNIGHT J, GUNATILAKA R.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113-124.
- [23] JIANG S, LU M, SATO H. Identity,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40(6): 1190-1200.
- [24] 锁凌燕, 陈晓宇, 王正位, 等. 户籍制度、身份认同和风险承担——基于 CHFS 数据的分析 [J]. 经济科学, 2023(4):178-202.
- [25] ALESINA A, TELLA D R, MACCULLOCH R.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9-10):2009-2042.
- [26] 桑林. 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 [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6):31-45.
- [27] GALLO L C, MATTHEWS K A. Understan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hysical health: do negative emotions play a role?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3, 129(1):10-51.
- [28] HOWELL R T, HOWELL C J.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statu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eta-analysi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134(4):536-560.
- [29] MIZOBUCHI H. Measuring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sensitivity of happines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7, 18(2): 463-504.
- [30] HELLIWELL J F, SACHS J D, LAYARD R.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 [M].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18.
- [31] TELLA D R, GALIANI S, SCHARGRODSKY E.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evidence from the allocation of land titles to squatter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1):209-241.
- [32] BARGER S D, DONOHO C J, WAYMENT H A.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race/ethnicity, 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to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09, 18(2):179-189.
- [33] 闰丙金.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J]. 统计研究, 2012, 29(10):64-72.
- [34] 尹振涛, 李俊成, 杨璐. 金融科技发展能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吗——基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8): 63-79.
- [35] 叶璐, 王济民. 我国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定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2):123-134.
- [36] 高静, 初立苹. 社会保障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结构分解 [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3, 30(4):101-124.
- [37] SEN A.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M]. Dutch: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38] 尹志超, 岳鹏鹏, 陈悉榕.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J]. 金融研究, 2019(4):168-187.
- [39] 王群勇, 李仲武, 冯学良. 身份、性别与幸福——基于家庭层面的分析 [J]. 世界经济文汇, 2020(5):105-120.
- [40] 陈吉平, 赵丽敏, 任大鹏. 村庄民主与农民幸福——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分析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181-192.
- [41] 李仲武, 冯学良. 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越幸福吗? [J]. 统计研究, 2021, 38(10):121-133.
- [42] SCHNEIDER S M.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life satisfaction: what role do social cognitions play?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 106(3):419-438.
- [43] 刘欢, 向运华. 基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内在机理、存在问题及实践路径 [J]. 社会保障研究, 2022(4):45-59.
- [44] 张可云, 王洋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式及其对收入分化的影响——基于 CGSS 数据的观察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8): 43-62.
- [45] BREEN R, KARLSON K B, HOLM A.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J]. Social methods & research, 2013, 2(42):164-191.
- [46] CHYI H, MAO S.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1): 167-185.

## Do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Enhance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CHU Liping, GAO Jing

**Abstract** Improving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which is an essential path toward this goal, ensures that farmers share the frui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by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from 2012 to 2021,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KHB method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integration on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especially among CPC members and the elderly. Compare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welfar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social assist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helps farmers transfer pension and medical risks and strengthen family identity, thereby improving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Marginal effect reveals that for every unit increase i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feeling "relatively happy" and "very happy" increases by 0.378 and 0.546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integration and increase the pay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or specific groups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integration; risk transfer; class identity

(责任编辑:王 薇)